

参 考 信 息

江苏理工学院图书馆主办

第 4 期 (总 233 期)

2019 年 4 月 25 日

本期要目

特别关注

教育部等四部门部署启动1+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 (2)

高等教育现代化要破解三大难题..... (3)

教育透视

专硕十年, 还是学硕的“备胎”吗..... (7)

让思政课变得越来越鲜活..... (9)

高校探讨

实施“双高计划” 舞起发展龙头..... (11)

教育部等四部门部署启动1+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

日前，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了《关于在院校实施“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试点方案》（以下简称《试点方案》），部署启动“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简称1+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

把学历证书与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结合起来，探索实施1+X证书制度，是职教20条的重要改革部署，也是重大创新。《试点方案》提出，自2019年开始，重点围绕服务国家需要、市场需求、学生就业能力提升，从10个左右职业技能领域做起，稳步推进1+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试点院校以高等职业学校、中等职业学校（不含技工学校）为主，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学校、应用型本科高校及国家开放大学等积极参与。

培训评价组织作为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及标准的建设主体，对标准质量、声誉负总责，主要职责包括标准开发、教材和学习资源开发、考核站点建设、考核颁证等，并协助试点院校实施证书培训。院校是1+X证书制度试点的实施主体。试点院校要推进“1”和“X”的有机衔接，进一步发挥好学历证书作用，夯实学生可持续发展基础，积极发挥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在促进院校人才培养、实施职业技能水平评价等方面的优势，将证书培训内容有机融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优化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对专业课程未涵盖的内容或需要强化的实训，组织开展专门培训。鼓励试点院校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并举，在面向本校学生开展培训的同时，积极为社会成员提供培训服务。

教育部将结合实施1+X证书制度试点，探索建设职业教育国家“学分银行”，对学历证书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所体现的学习成果进行认证、积累与转换，促进书证融通，探索构建国家资历框架。《试点方案》强调，要建立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和培训评价组织监督、管理与服务机制，建设培训评价组织遴选专家库和招募遴选管理办法，定期开展“双随机、一公开”的抽查和监督。培训评价组织的行为同时接受学校、社会、学生、家长等的监督评价。教育行政部门、院校要建立健全进入院校内的各类证书的质量保障体系，杜绝乱培训、滥发证，保障学生权益。

《试点方案》明确，教育部负责做好1+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的整体规划、部署和宏观指导，对院校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实施工作负监督管理职责。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和产教融合型企业要积极参与实施培训。中央财政将建立奖补机制，引导各地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培训和考核工作。

根据《试点方案》要求，近期将首批启动 5 个职业技能领域试点，并于 2020 年下半年进行试点工作阶段性总结。日前，教育部委托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在建筑工程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物流管理、老年服务与管理、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等 5 个领域遴选确定了参与首批试点的有关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包括：建筑信息模型(BIM)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Web 前端开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物流管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老年照护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汽车运用与维修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和智能新能源汽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摘自：人民网-教育频道 2019-04-16)

高等教育现代化要破解三大难题

今年 2 月发布的《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提出了到 2035 年总体实现教育现代化，迈入教育强国行列，推动我国成为学习大国、人力资源强国和人才强国的宏伟目标。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重要一环。要实现 2035 年的宏伟目标，还需认真思考并解决知识生产的体制化、大学治理的行政化、学术评价的量化导向这些促进着高等教育发展但同时逸出负面效应从而困扰着高等教育的三大难题。

1. 知识生产的体制化与反体制化

人类知识和文明不断发展和扩大的历程，也是一个知识生产行为和过程被不断体制化的历程。这种体制化，在价值观方面，体现为确立了知识生产的独特价值，宣告了知识生产作为人类社会重要生产方式的合法性和优先性；在组织架构上，体现为建立了进行知识生产和传播的各种专门机构，比如大学和各类科研院所；在制度安排上，体现为形成了一套与知识生产、传播与应用相适应的明示或潜在的社会规则，包括知识分类与学科划分、范式和学术共同体、知识生产过程、人才培养与成果评价、投入机制，等等。

知识生产的体制化使得大规模的知识生产成为可能，极大地促进了知识的交流、传播与创新，也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与整体福利。可以说，没有知识生产的体制化，人类社会就不可能如此快速地进入现代化。但是知识生产的体制化在积极促进知识生产的同时，消极的一面也日益显现。比如知识的学科化，在推动知识专门化深入化的同时，人为制造了不同学科之间的藩篱，导致了知识的分离；而学科范式、学术共同体和科研体制的形成，无疑宣告着某些知识生产方式和某些生产人员的优先性，使得社会

资源能够流入这些领域这些人员的生产活动，而没有被纳入范式和体制之内的知识、问题和人员则被排除在外，导致了知识生产的固化和知识创新的变缓。

但是，知识本身是灵动的超越的，从来不会给更有权势更有财富者更多发现新知的机会，有时反而是那些超出现有体制和思维束缚的人，有着更大的发现潜能。所以知识生产在被体制化的同时，总是有着反体制化的倾向。这种反体制化的倾向，一直夹杂在知识生产体制化的过程中，并随着人类认识世界能力的加强，越来越明朗。20多年前，英国学者吉本斯等人在社会观察中发现，在传统的、人们所熟知的知识生产模式之外，正在浮现出一种新的知识生产模式，这种新的知识生产模式不仅影响生产什么知识，还影响如何生产知识、如何组织和激励知识生产、如何监控和评价质量。相对于传统的知识生产模式，新模式的研究问题在应用情境中提出，而不是由某个特定的学术共同体主导；新模式无论从人员、过程还是研究方法来说，都是跨学科的、异质的，与传统模式基于学科的、同质的取向不同；相对于传统模式在组织上的稳定结构和等级制，新模式的组织设计更加多变和非等级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新的知识生产模式是对传统知识生产体制化的一种反动，体现了知识生产冲破体制束缚的努力。这种新的知识生产模式，近年来在一些高科技企业已经被广泛应用。

但是，作为知识生产、传播与创新重镇的大学呢？尽管这些年来，一些大学力图通过建立跨学科组织、各类综合性智库和协同创新中心来突破原有体制的约束，并主动去拥抱慕课、微课等新的知识传播方法，但学科化、同质化的传统知识生产模式依然在大学中占据统治地位。正如人们总是很难拽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一样，大学如何作为高度体制化的产物，去突破体制化的障碍，回应知识生产模式变革带来的挑战，是推进高等教育现代化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2. 大学治理的行政化与过度行政化

近些年来，中国大学治理的行政化问题饱受人们诟病。事实上，大学治理的行政化并不是中国社会独有的现象，而是当前世界各国大学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只是由于中国社会处于转型之中，使得这个问题更加突出。这个问题与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高等教育大众化、新公共管理主义的盛行等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知识经济和高等教育大众化把大学从以往社会的边缘转置于社会的中心，政府和社会对大学的关切度前所未有，投入力度也前所未有。高关注度和高投入力度自然就带来对成果和绩效的高期望值，加

上新公共管理主义的推波助澜，大学面临着越来越沉重的社会问责。大学内的单个学者或是系科并没有能力代表大学回应社会问责，因而有可能代表大学整体来对社会问责进行回应的大学行政层兴起，大学校长不再只是学者的代表，同时还担当政府或社会的代理人。为了促进学者和基层组织的生产以回应问责，大学的行政系统和行政管理职能不断加强。所以，过度行政化从某种意义上是大学现代化的一种必然。

但是，大学的主要功能还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利用知识服务社会、传播文化，学者们从事的是需要创造力的学术生产，而不是标准化的物质生产，科层制的行政效率常常并不能带来学术效益。管理学大师明兹伯格等经过比较认为，大学这类专业组织与传统科层组织不同，并不适合一般科层制的管理模式，因为：第一，与传统科层制聚焦于权力顶端不同，由于受到教学科研工作性质的影响，大学运行有权力下沉的特点；第二，知识生产的分工使得学者的工作普遍有双重忠于现象，他们在忠实于自己的工作单位的同时还忠实于自己的专业和学术共同体；第三，学者们在日常工作中彼此相对独立，但与自己的服务对象比如学生、某个基金或合作单位关系紧密；第四，学者们的成果是在共有的知识基础上加入了自己的探索和经验，实现了个性化的转化，所以难以统一要求和进行测量。

显然，为满足知识生产需要形成的学术文化与回应社会问责需要形成的行政文化在价值取向上有着不同，因而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与冲突。学者自由散漫、自行其是风格让行政管理者头疼不已，而行政管理者标准化、功利化的管理倾向也被学者们抱怨不休，认为约束了学者探索知识的热情。如何解决或调和行政化与过度行政化之间的矛盾，是体现大学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现代化的重要问题。

3. 学术评价的科学化与伪科学化

在去年的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指出，健全立德树人落实机制，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评价指挥棒问题，从而将解决教育评价问题上升到了党和国家关切的高度。“唯论文、唯帽子”正是针对学术评价而言。

一般认为学术评价的问题，是评价方式不够科学带来的，但当前学术评价问题的根源，恰恰是对所谓科学化的追求。随着人类进入以经验和实证为主要方法认识世界的时代，科学常常被定义为一个建立在可反复验证基础上的知识系统。越是依赖于可计量的

经验数据的知识，被认为是越“硬”的科学。当前的学术评价大多也采取了这种工具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倾向，人们寻找各种量化的工具和方法来对学术进行评价，比如，计算论文发表的数量，对学术期刊进行人为的等级划分，计算获取项目和基金的数量甚至金钱的数量，对学者设置各种奖励各种“帽子”，对学科学术学校设置各种权重各种赋值。

但是学术真的可以用这种形式主义的量化方式来进行评价吗？我们知道，学术研究的本质是探索知识，是一个不断探求未知的过程，用有限的已知来评价对无限未知的探索，显然就有认识论和逻辑上的悖论。探索未知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人们很难事先断定什么是正确的或有效的探索。正如爱因斯坦所言，“科学史表明，伟大的科学成就并不是通过组织和计划取得的；新思想发源于一个人的心中”。前些年一位日本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的创新就在于不小心把试剂错误地放入了某个既定的实验当中，而首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伦琴关于 X 射线的传奇发现更是为人们津津乐道，这种因为“失误”或“偶然”带来创新的故事常见于科学史，其实就从一个角度强调了创新是对陈规和已知的突破。所以，学术研究的本质决定了它应该是一个自由探索的过程，对其进行评价需要十分慎重，越是号称可以量化和标准化的评价就越是可疑，越有可能是披着科学外衣的伪科学。

要促进和激励学者的知识生产活动，似乎不能没有学术评价，但什么是真正科学的学术评价值得深思。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人们认识水平的有限性决定了合格评价比优秀评价相对科学。认识世界是一个渐进过程，科学探索总是充满试错，人们往往先知道什么是错误的落后的，而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先进的，通过合格评价来避免一些已经被验证是错误的做法是可行的；但优秀评价评出来的未必是先进的探索，特别是优秀评价形成的导向很容易把人们引入科学探索的窄途，限制人们科学探索的视野和能力。

以上三大难题涉及大学这一推进高等教育现代化核心机构的三个根本问题，那就是：怎么组织知识生产？怎么运行管理？怎么评估效益？知识生产的体制化、大学治理的行政化和学术评价的“科学化”，本身就是现代化过程中的产物，如何在进一步推进高等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克服它们越来越扩大的负面效应，是不得不面对的难题。要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成为高等教育强国，意味着在解决全球高等教育共同问题上有切实有效的探索和先进的经验，有能力回答好这些普遍性难题并能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

（摘自：光明日报 2019-04-23）

专硕十年，还是学硕的“备胎”吗

从2009年起，教育部决定大部分专业学位硕士开始实行全日制培养，并发放“双证”。当时，专硕在研究生学位中所占的比例从10%上升到近一半。那时，教育部计划到2015年将使二者比例达到1:1。如今，我国的硕士研究生中，专业硕士占比达到56%，这是2009年以来专业硕士规模首次超过学术型硕士。

然而，在专硕强势进入研究生教育的10年中，大学生对它的看法和争议一直存在。有的学生认为，专硕是学硕的“备胎”，当自己考不上名校学硕的研究生时，专硕便成为进入名校的另一条途径。也有同学认为，专硕以就业为导向，强调实践和应用，一定会在就业市场上得到更大的优势。

除了“性价比”，他们为何选择专硕？

专硕的存在感越来越强了。根据中国教育在线发布的《2019年全国研究生招生调查报告》，2017年专业型研究生总量42.5万人，专业硕士占比99.3%，达到40.2万人。硕士研究生中，专业硕士占比达到56%，2009年以来专业硕士规模首次超过学术型硕士。调查显示，大学生报考专业型硕士的意愿更强烈，达到56%。考生选择专业硕士的首要原因是可以获得更多专业技能，其次是由于难度低于学硕而选择专业硕士，第三是因为学制时间短。

“专硕的‘性价比’比较高。”“学硕是3年，写论文的时间更长一些，要是以后想读博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学术帮助。像上课内容、毕业要求、就业方向等方面，专硕没哪样比学硕档次低。”

除了“性价比”，在如今就业压力大的环境下，不少大学生看重了专硕针对就业的培养模式。2016年，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77.3%的受访者身边有在读或已毕业的专硕。更喜欢实践和应用（54.7%）、专硕比学硕更有利于就业（53.0%），这两项是受访者认为攻读专硕的两个主因。专硕比学硕录取门槛低（32.9%）、被调剂成专业硕士（25.9%）和能有机会读研就行（22.5%），也是受访者认为学生选择报考专硕的原因。

专硕是学硕的“缩减版”？

都说是学硕的“备胎”，但专硕生的日子并没有那么好过。专硕和学硕的基本课程都是差不多的，都是专硕和学硕一起上。只是同样的课程，所以被压缩在了一年之内完

成。专硕的两年，不仅要求他们具备实践能力，还要练出很高的学术水平。很多学校尚未找到专硕的培养定位，所以两种培养机制没有本质区别，“老师和学生都迷茫。其实两种机制下，学生无论是时间还是学习的目标、未来的职业规划都有差异，但是学校却把专硕和学硕一样培养”。

在记者的调查中，不少学生都觉得三年两年的研究生没啥差别，然而，不少教育界人士却不这么认为。“现在的专硕在人才培养上有一个问题，就是‘两头不靠’。”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胡娟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时这样说。专硕和学硕在人才培养上应当有分工，专硕要培养的是高级的专业型人才。“这些年专硕总体发展势头良好，但是，一些学校把专硕当作了学硕的‘缩减版’，课程体系、人才培养目标等方面没有做得那么明确和清晰。由于学校在过往的人才培养上缺乏经验，对于如何产学结合，让专硕更好地与职业岗位匹配等方面，有的学校、有的专业做的不够好。”

专硕的未来往何处去？

从就业市场的反馈来看，专硕的表现十分亮眼。去年年底，一份《江苏省研究生教育质量年度报告（2018）》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其中提到，“江苏省专业学位毕业硕士研究生就业率比学术学位毕业硕士研究生高 0.33%。毕业研究生平均月薪为 6343 元，增幅达 10%；而专业学位毕业研究生平均月薪比学术学位毕业研究生高出约 5%。”那么，学生对于自己专硕的选择评价如何？

今年 4 月发表在《研究生教育研究》的一篇名为《研究生如何评价其导师和院校？——2017 年全国毕业研究生调查结果分析》的文献在分析来自 70 个研究生培养单位的 20444 份针对专业硕士的问卷后得出，专业硕士的总体学业满意感指数在博士、学术硕士、专业硕士三者中最低，为 77.88%。博士为 83.42%，学术硕士为 79.31%。文章指出，专业硕士对课程教学表示满意的比例偏低。71.23%的人对“专业课授课教师对课程教学的重视程度”表示满意；67.26%的人对“专业课授课教师将理论知识与专业实践相结合的程度”表示满意；59.79%的人对“案例分析和实践研究在专业课中的比例”表示满意；66.21%的人对“专业课提升自身实践能力的帮助程度”表示满意。不少学生反映，专硕虽然是实践至上的培养模式，但在毕业方式上往往只能选择毕业论文一种模式。和学硕几乎一样的毕业方式让不少研究生感到自己上了一个“假专硕”。那么在当下的大学“严出时代”，专硕如何在兼顾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下把好质量关？

“从专硕的人才培养质量上来看，目前有两方面问题。一是学术性上，有的专硕对于学术性的要求是下降的，但是在下降过程中，由于缺乏全盘、系统考虑，导致专硕课程系统性差。二是学校在设立面向实践的一些新的课程时，不是太有经验。”在评价专硕人才培养质量上，不能照搬学硕的评价标准，应结合专业实际，建立出论文以外的不同的评价标准。

从宏观来看，专业硕士符合社会的发展方向。“我们的硕士人才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这确实值得思考，因为大部分的硕士生毕业就直接就业了，他们的目的并不是所谓‘博士的过渡阶段’，所以我们并不需要那么多的学术硕士。而专硕是面向行业培养人才、划分专业的。专硕是更符合社会发展变化的，因此我看好它的发展前景”。胡娟强调，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专硕的人才培养方面，除了要特别强调它的实践性以外，还要重视培养学生的专业基础和理论思维。

“我们培养的专硕不光是专业性人才，而且是高层次的。这个‘高层次’是指有理论思维的人才，他们应该能在日常工作中突破具体的实践，通过抽象分析，发现和寻找客观规律的，应该是可以推动和带动自己这个行业的创新和改革发展的。因此专硕和高职、应用型本科不一样，在强调实践的同时，我们不能忘记培养学科基础和理论基础，否则他们就不叫硕士了。”

（摘自：中国青年报 2019-04-22）

让思政课变得越来越鲜活

机械工程导论课串联起工程实践中的职业道德、工程实践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等理念；公共英语课融入中国文化、中国经济、京味儿文化和校史校情等知识……这是思政课，还是专业课？答案是——这是具有思政元素的专业课。自2017年底，北京联合大学开启“课程思政”建设步伐，把价值观培育和塑造融入课程，润物无声，立德树人。

我国高等教育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要理直气壮开好思政课。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青少年思维活跃、可塑性强，备受关爱的同时也经受着“成长的烦恼”，如果不能尽心培育和科学引导，很可能“发育不良”。以前谈及有些思政课，老师不爱讲，学生不爱听，课堂枯燥无味，其中一个原因是未能以学生为本，不能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没有兼顾学生的关注点、兴奋点、共

鸣点，让他们感觉不解渴。因此，思政课要直面学生困惑，让学生认同和信服，不仅要以理服人，还要以情感人，打造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的“金课”。

思政课教学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好的思政工作应该像盐，但不能光吃盐，最好的方式是将盐溶解到各种食物中让人自然吸收。筑牢课程教学主阵地，守好思政教育责任田，把思政课办得越来越好，必须围绕教学需要推动思政课改革创新，推进“思政课程”向“课程思政”转化，不断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针对性和亲和力。思政课教学的重点是直面社会热点，挖掘鲜活故事，带领学生进入现场、感受真实、体验真情，进而破解学生疑惑，达到育人目的。

思想政治工作从根本上是做人的工作，必须围绕学生、关照学生、服务学生，坚持守正创新，保持与时俱进。思政课从来不是“一条线”的工作，而是各类课程与思政课的相辅相成，共同绘就“课程思政”同心圆。思政课不能封闭僵化、自说自话，要结合办学特点和办学规律，结合学生成长成才需要，把立德树人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贯穿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各领域，以文化人、以德育人，拓展主阵地与主渠道结合、校内与校外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渠道。思政课教学不能照本宣科、千人一面。思政课教师要增强教书育人的使命感，加强思政课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工作创新，升级改造传统课堂，丰富教学手段，改善教学状况，通过生动、深入、具体的纵横比较，把一些道理讲明白、讲清楚，不断提高学生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文化素养。简而言之，思政课既要聚焦理论创新，关照社会现实，更要贴近学生需要，传播人文关怀，以生动活泼的成果吸引人、打动人、感召人，这样才能提高“抬头率”、提升“点头率”，增强思政课的凝聚力、吸引力和引导力。

办好思政课，离不开一支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精湛、育人水平高超的高素质专业化思政课教师队伍。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传道者自己首先要明道、信道，育人者要先受教育。做好思政工作，教师不仅要身体力行，还要潜心育人，把工作做到入脑入心。广大教师要坚持政治要强、情怀要深、思维要新、视野要广、自律要严、人格要正，强化理论素养，拓展教育载体，创新教学方法，充分挖掘各类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引导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思考问题，给学生心灵埋下真善美的种子，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切实提升立德树人的实效。

（摘自：中国教育报 2019-04-18）

实施“双高计划” 舞起发展龙头

“从示范（骨干）校建设，到优质校建设，再到‘双高计划’，并不是简单的优中选优，而是以持续的政策供给，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推动职业教育发展。”近日，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副司长谢俐撰文指出，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启动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简称“双高计划”），准备集中力量建设50所左右高水平高职学校和150个左右高水平专业群，旨在引领新时代职业教育实现高质量发展。

从工作定位来讲，“双高计划”对高职教育战线而言，是要在“后示范”时期明确优秀学校群体的发展方向；对职业教育战线而言，明确如何引领新时代职业教育改革创新、加快实现职业教育现代化；对经济社会发展而言，明确如何服务国家战略和回应民众关切。

从工作目标上讲，“双高计划”就是要坚定走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发展道路，坚持扶优扶强与提升整体保障水平相结合，着力建设一批促进区域经济转型发展、支撑国家战略、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高职学校，着力建设一批服务、支撑、推动国家重点产业和区域支柱产业的高水平专业群，实现“当地离不开、业内都认同、国际可交流”。

高职教育是我国首创的教育类型，伴随改革开放后经济转型升级，高职教育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探索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模式；高职教育具有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双重属性，本质上是职业教育，以往的成功探索在于坚持了这一定位，以后的成功发展仍要坚持职业教育的类型方向；高职教育要把高质量供给作为发展方向，满足人民群众和经济社会对优质多层多样高职教育的需要。

截至2018年年底，全国共有高职院校1418所，高职在校生达到1134万人，5.8万个专业点覆盖了国民经济的主要领域，毕业生半年后就业率在90%以上。高职生绝大部分来自农村和城市低收入家庭，近3年来，850万家庭通过高职教育拥有了第一代大学生，有力促进了教育公平、社会公平。另据统计，在现代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一线新增的从业人员70%以上来自职业院校毕业生，有力提升了我国人力资本素质，支撑了经济社会发展。

“高职教育率先开展考试招生制度改革。高职教育分类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是国家高考招生改革的先行者和探索者。”谢俐介绍，2006年起，即开展了示范高职院校单独考试招生改革试点；2013年，明确了基于高考的“知识+技能”招生、单独考试招生、综

合评价招生、对口招生、中高职贯通招生、技能拔尖人才免试招生等 6 种招生方式；2018 年全国高职院校分类考试占当年高职招生计划总数的 54%， “避免了 ‘千军万马挤独木桥’ 现象， 为学生接受高职教育提供了多种入学渠道。”

当前高职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一是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不够完善，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还很薄弱，技术技能人才向上成长的渠道还不通畅；

二是制度标准不够健全，办学特色不鲜明，很多方面参照普通教育办学，实训基地建设有待加强，教材、课程与生产实际脱节，滞后于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

三是各地对高职教育的支持力度不平衡，有的没有把职业教育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生均经费等保障政策还不健全，企业参与办学的积极性不高；

四是部分高职院校发展自信不足，不是集中力量立足本位、提高质量、办出特色，而是把工作的着力点放在了推动学校升格上；

五是“崇尚一技之长、不唯学历凭能力”的良好氛围还未形成，技术技能人才在就业和发展上还存在不平等待遇，导致高职教育社会吸引力不强。

“随着我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不断加快，各行各业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越来越紧迫，高职教育重要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凸显，到了必须下大力气抓好的时候。”谢俐指出，1月24日，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是办好新时代职业教育的顶层设计和施工蓝图；实施“双高计划”，旨在重点支持一批优质高职学校和专业群率先发展，舞起了职教的发展龙头，需要“打一场高职教育提质升级攻坚战”。

（摘自：中国教育报 2019-04-16）